

漫谈大学品流

美国杜兰大学 李志文*

1. 引言

前任浙江大学新校长杨卫在接受《大学周刊》访问时^②,对大学的发展谈了一些相当精辟的看法。他说:“以美国大学为例,它们是三流学校数论文篇数,二流学校数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流学校不对论文发表提要求,而顶尖的大学非常强调教学。”下面就是他的精辟分析:

当一所学校的教师还没有形成很好的研究习惯时,学校从管理上要求教师发表论文,并且是在国际同行认同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驱动力。从统计学的角度上看,论文发表得多就意味着教师花在做研究上的时间更多。因此,三流大学要提升,就得要求师生多发表论文;而二流大学则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再发展,这位教师就能几年磨一剑,做一些引导、引领这个学科发展、更带有原创性的工作,带领学科往前走,那他就是国际一流学者了。所以,一流大学不要求教师发表很多文章,也不要求他们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只是给更宽松的环境做研究,由教师在好奇心驱动下自由发展。在国际上前几名的顶尖大学,所有的教授都是该学科同年龄段里最优秀的。因此,这些学校要求其教师除了保持自己作为这行顶尖的学者外,还要花时间在学生身上,让这些最好的学生受到教育和启迪。因此,每所学校发展阶段不一样、水平不一样,对发表论文所强调的内容也就不一样了。

上面这段话讲得太对、太好了。不是在世界一流名校待过较长时间的学者,是不会有此高见的。杨卫到底是开国以来第一个当了大学校长的长春藤毕业生。

按照杨卫的标准,当今中国的高校刚刚进入世界三流大学的水准。十年前,中国大学是没有资格谈 SCI 的。现在,中国大陆的顶尖学校,在 SCI 的数量上已经能在亚洲占一席之地了;就是与美国相比,也不见得丢人。中国有人海优势,所以再往后,这个成绩会更好。但这种比

* 李志文,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杜兰大学蔻翰讲座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浙大光彪讲座教授;厦门大学特聘教授;电子邮件:jevonslee2009@gmail.com。

② 参见《大学周刊》2006 年 10 月 11 日,《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大师、大楼、大学精神,缺一不可》。

法再往后已经没有什么大意义了,因为世界一流二流学校不跟我们比这个。要用人家一流二流学校的比法,大陆的高校就又回到起点上了:重新洗牌,咱们的成果不容乐观。

我今天要谈的问题是:大陆的高校还要当多久的三流大学?我们怎么才能进入一流大学?每所大学都成为顶级大学是没有把握的,只能把这作为一个崇高的目标。

我个人幸运地在美国的顶级大学待过——先是在芝加哥大学当过三年的助理教授,然后到宾西法尔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当副教授。1980年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与经济系,应该是顶级的,甚至是第一的。在1990年,芝加哥大学统计过:90%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所有知名商学院的会计学与金融学的当家学者(即讲座教授,但通常不是系主任)也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这几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与商学,一流没有问题,顶级可能就不是公论了。现在顶级的位子,应该是哈佛与沃顿。1983的沃顿应该只能算一流,哈佛商学院连一流都谈不上,甚至被认为是一群二流学者拿着哈佛的老牌子在招摇撞骗。我的母校罗彻斯特大学在我念书的时候(1974)应该是一所一流大学在做着顶级大学的梦,现在是一流大学在往下降。我现在担任讲座教授的杜兰大学应该是一流的尾巴,但杜兰从来没有做过顶级的梦,想都不敢想,连一流都岌岌可危。排名表上都是美国的大学,二次大战后,老美在各方面称霸了六十年,学术也不例外,所以不能不用老美来做度量衡(calibrator)。表1上列出的三所英国大学,则是十八世纪大英帝国的回光返照。

从我的分析来看,二流与三流可以按学校来分;一流多少还能按学校分,顶级的大学与顶级的专业就不一定在同一个学校了。顶级大学的排名是相当稳定的,基本上取决于历史、资源及地缘环境。顶级专业的排名是相当不稳定的,走掉一个大师,或者大师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顶级的位置就保不住了。以大学来分,现在大陆的好学校,应该是三流;但大陆的顶尖学校,有些专业领域已经有点二流的味道。中国绝大部分的大学是不入流的(别难过!),印度也一样,甚至日本也好不到哪里去——日本自从百年前有些大学冲进三流后,绝大部分的大学还是不入流。日本是靠武力与团结力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在学术与思想上面并没有太多的建树。这几年,北大与清华的国际化与超前意识都比绝大部分的日本大学要来得强烈。

我曾在香港科技大学(港科大)做会计系的创系主任。在我离开港科大的那一年,按顶级学术成果排名,做到了世界第一,但是多少是玩了花招。1999年的港科大会计系应该是扎扎实实的二流顶端,而且是美国之外的第一名。港科大的这个第一也是岌岌可危,因为香港中文大学来势汹汹。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会计学与金融学领域里,全是老美的天下,老欧只有亦步亦趋的份。由于拥有大海龟与牛外教,在会计与金融领域,香港的三大(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基本上比欧洲大学好,而且独步亚洲。

2. 什么是二流大学?

杨卫为二流大学做了相当好但不完美的定义:

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这个定义不完美的地方就在“一年能……发一两篇”这句话上。我认为:到了二流学校,基本上已经不用简单的数字管理,在任何一个领域的最好杂志一年能发一二篇论文,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别说二流大学的教师了。这点我在下文会详细分析。

我先分析一下三流大学与二流大学的不同。三流大学,应该是像美国的州立大学这样的学校。这些大学有一个共同特性,即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是“外行官员管内行学术专家”,就是咱们所说的“红管专、外行管内行”。这些外行官员都要找一些“客观标准”来做管理依据,那自然就是“数字挂帅”了。而美国的这些三流大学都是资源较少的州立大学,这些大学中有些被定位为教学型大学,像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ies;有些则是小州的州立大学,像 Kansas State。这些大学的校长底气不足,难以抗拒州政府与议员的干涉。天下英才有限,到了这些学校,能分到的英才,就微不足道了;而“数字管理”倒是简单明瞭、成本低廉。在亚洲,在官本位下,校长发挥的空间有限,许多大学处在新兴国家,资源也有限。发展学术的第一步,就是先让教师们有拿到学位后继续念书和科研的习惯。用 SCI 数目来管教授,就如同用考试来管学生,没有太多的实质教育与学术效果,当然总比不管好。到了不入流的大学,基本上就是随意管了。

表 1 是基于美国大学最被认可的排名——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 2006 报告,再依照我自己的判断,列出的一些顶级、一流、二流及三流大学的例子。每一类中,按照排名的顺序,由高到低罗列。顶级与一流大学是全部罗列;二流、三流大学众多,只是例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排名在美国是最少争议的排名了。排名免不了受主观判断的影响,这个表只是例子,而不是科学。表中的顶级与一流大学几乎清一色是美国学校,这是因为美国有最好的制度设计,几乎把全世界的学术精英完全吸收过去了。在一流大学里,我也列出了法国的 Ecole Polytechnique,其实只是出于“公平”的考虑。法国的 Ecole 有点像大陆的高校:学生是最好的,不输给任何一所一流大学、设备也还不错、但是师资与学术环境就比美国的一流大学差多了。亚洲的三家二流大学,比如香港的科大与中大以及日本的筑波,受美国大学的影响都很大。我这样说,读者可以认为我有偏见。我走遍世界,在欧、亚、北美、南美各国的顶尖大学中都有些朋友,参观大学、分析学术环境是我的嗜好,本文只能说是我的看法,不能说是我的科学论断。做学术是要尽可能地寻找客观的数据,而学术结论则都是带有研究者的主观色彩的。

在表 1,读者也可以看到:顶级大学全是美国的私立大学;较好的一流大学,也还都是美国的私立大学;而到了一般的一流大学,公立大学就多了起来。二流大学与三流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学。这就是资源与体制的互补了:私立大学体制灵活,如果有足够的资源,会办得比公立大学好;但是,如果资源不足,那么私立大学的灵活体制反而会导致它们胡作非为。

表 1 依照作者判断的大学品流示例

顶级大学	一流大学 A	一流大学 B	二流大学	三流大学
Princeton	Univ. Pennsylvania	UC–San Diego	Maryland	东京大学
Harvard	Columbia	UNC–Chapel Hill	Florida	大坂大学
Yale	Duke	U Illinois	Ohio State	清华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rown	UT–Austin	U Pittsburgh	北大
Stanford	Cornell	NYU	Boston U	首尔大学
MIT	UC–Berkeley	Univ. Virginia	Texas A&M	中国台大
Chicago	Washington U	Toronto	Rutgers	National Singapore U
	Northwestern	UW–Madison	Purdue	U Alabama
	Carnegie Mellon	Ecole Polytechnique (France)	U Iowa	U New Hampshire
	Univ. of Michigan	Univ. of Sothern California	Indiana – Bloomington	California State Univ. System
	Johns Hopkins	U British Columbia	香港科大	
	Dartmouth College	Rochester	Michigan State	
	Rice	U Minnesota	SUNY Buffalo	
	Vanderbilt	Case Western	U Kansas	
	Emory	Georgia Tech	U Arizona	
	Cambridge (UK)	Lehigh	香港中大	
	Oxford (UK)	U Washington	日本筑波大学	
	UCLA	UC Irvine		
	Georgetown	Notre Dame		
		Tulane		
		Penn State		
		LSE (UK)		

注：本表是基于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2006 的排名,再依作者的了解加以调整而成。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排名偏重本科教育的角度,而本表的微调多考虑了些研究成果的因素。表上所列的顶级与一流大学,我大多亲身访问过——其中的每一所学校都有我相识的朋友,我还在其中一半的学校做过学术报告。

中国台湾的台大,大陆的北大、清华被列入三流,这是让人非常气愤与不服的。北大、清华、中国台大的学生素质绝对超过我所任教的杜兰大学。北大、清华、中国台大的老师的“脑素质”也不逊于杜兰大学的老师。为什么杜兰可以在一流大学中吊个尾巴,而我们的北大、清华被列入三流呢？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杜兰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北大、清华则是中国的公立

大学。环境与体制,决定了学术机器的生产效率,原料的品质(老师、学生的天生素质)当然也会影响成品的质量(学术成果),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二流大学,应该是 SUNY/Buffalo, Rutgers, Florida, Kansas 以及香港科大这一类的大学。这些大学由于资源、地缘及历史因素,所以没法与一流大学较短长。表上的一流与二流大学的运作、目标、愿望,基本上是一样的。它们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顶级大学的年轻副教授通常是一流大学争聘讲座教授的目标;而一流大学的少壮副教授则通常是二流大学争聘讲座教授的目标。三流大学与二流大学之间的交流就要少得多了。北大与清华已经有点二流大学的架势,这是因为:它们已经有点能力在一流大学的少壮精英头上动脑筋了!例如清华用了五年的时间来操作,礼聘钱颖一从 Berkeley 回清华,而 2006 年的浙大则刚刚才有这种念头呢!

在顶级大学谈文章的篇数是一种粗俗的行为,会被大家取笑、不齿。在那种学校的学者,著作等身、大气蓬勃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好吹的。在一流大学,学者们梦寐以求“这辈子”能有“一、两篇”传世之作。但是这个梦是深藏心底,不能说的,说出来就不入流了。在二流大学,是公开地说:“想当教授,就得有一、两个‘全垒打’”。意思就是,想当教授,非得在顶尖杂志发表 1、两篇论文不可。如果像杨卫说的那样,每年要发一、两篇,就成了“牛饮”,只有三流学校的牛才会这么公开地叫。二流学校公开招聘讲座教授的时候,基本上看的是论文的品质,而不是数量。可是在内部提升的时候,基本上看的是数量,而不是品质。人家已经做牛做马怎么多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咱二流大学资源有限,哪能养得起这么多神仙?只要你还努力听话,时间到了,苦够了,也就当上了教授了。

看一个学校的教师管理机制,就能看出这所学校的定位。在顶级大学,教授几乎人人有个讲座(endowed chair)教授的头衔,这些老爷们都是学校千辛万苦从对手那里挖过来的。助理教授几乎没有一个能升上去。能升上去的只是极少数,因为老早就有对手在挖墙角,又得千辛万苦地挽留,年纪轻轻,就得给他个讲座教授。校长的任务不是“管”这些人,而是哄着他们,陪着笑脸,防着他们与别人谈恋爱。校长更重要的任务,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知道各专业领域的动向,聘请到能领导未来 20 年学术方向的大师。校长对大师哪敢说个“管”字,磕头都还来不及呢!那怎么“管”这些老爷们呢?出个假货怎么办?别担心,这些人好管极了。只要你的学校有足够的大师——顶级大学当然是大师如云,大师之间会互相把对方管得贼紧——老子好不容易混到这个江湖名声,才能如此吃香喝辣,我们中间如果出了一个假货,别人对我们的本事就会产生怀疑,那我们数十年的修行,岂不被糟蹋了!在顶级大学里,每周定期的研讨会就是擂台,那些大师们在擂台上杀得你死我活。

当然,如果有一个顶级大学,请了个无能校长,一口气找了一群假大师,那么这个大学就马上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个顶级大学也就垮了。这就是为什么顶级大学都在美国,又都是私立大学。因为目前只有美国的顶级私立大学才能发展出一个极精细的大师互相监管的“教授治校”的机制。美国的普林斯顿、哈佛、耶鲁用了三百年的时间,用世界最优越的

资源,运用市场机制,慢慢地把美国学术巨厦的上梁弄正了、弄直了。这样,美国的一流大学如伯克利、康奈尔才能放心地让教授来管自己、管学校、甚至管校长。

美国的三流大学基本上都是官本位,跟中国的大学一模一样。李远哲这个学化学的书生,在中国台湾倡导“教授治校”,把中国台湾的大学变成政治角力场,有点“书生误国”的味道。三流公立大学如果实施“教授治校”,全校教授一定“挖社会主义墙角”。没有大师级的学术地位,就没有了赔不起的面子。教授跟装配工一样都是人,一旦没有了赔不起的面子,就可以胡来;一旦没有人管,就容易乱来。三流大学用 SCI 数量管教授,就是防止教授乱来——这在我们管理学上就叫做防止“道德危险”(Moral Hazard)。

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所耗用的资源是惊人的,在外人看来是极度的浪费与没有效率的。师资是名校的命脉。这个“浪费”与“低效”在师资的培育上面最为显著。以美国的杜兰大学商学院为例:杜兰商学院在过去十年里起码招进了 50 个刚拿博士的年轻教师,每位教师的年薪,按 2006 的价码,是 15 万到 20 万美元;每个年轻教师可以呆六年,不升就走人。这六年的投资保守的估计是 15 万乘 6 乘 50,总共四千五百万美元。其中只有四位年轻教师升上副教授,其他的都为二、三流大学做贡献了。我们的教授,基本上都是从外边挖进来的。也就是说,顶级大学与其他的一流大学用了更多的价钱为杜兰做了贡献。以顶级与一流大学合起来的五十所学校作为一个整体,百分之九十的师资培育投资都为二流大学做贡献了。绝大部分的三流大学玩不起这个游戏,也就根本不玩了。从一流大学沦落到三流大学的人,基本上都放弃了“研究”。倒是那些一直在三流圈子中的学者,有些还会兴味怡然地玩着三流大学的数字游戏。

有人会说,这些百分之九十的年轻教师会为顶级与一流大学发表大量的文章,所以值得这么多钱。你这就说错了。杜兰的这 50 个人,在十年内,发表了大约 50 篇文章,其中三分之一是那四位升上去的人发表的。其他 46 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具体成果。用清华、北大的“数字管理”概念来看,起码四千万美元是打了水漂了。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博士毕业生一辈子都没能在顶尖杂志上发表文章。发表在顶尖杂志上的百分之九十的文章,是由百分之一的学者写的。在杜兰商学院,学术成果主要是五个讲座教授(师资队伍 5%)做的。

你也许会说:那么,我们干脆就只让这五个学者专门做学问得了,何必花这么多钱,让这么多人陪着玩?这就是学术环境的成本!没有这么多人夜以继日的工作,就没有一流的研究环境;没有九死一生,就没有英雄好汉。这个问题我会在下文分析:“什么叫一流的研究环境?”

话说回来,中国可能穷些,中国的市场机制可能差些,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可能落后些。但是清华、北大的许多教授的天生素质可一点也不比什么普林斯顿的教授差。凭什么人家可以教授治校,被校长哄着、伺候着,而我们清华、北大的读书人就得服务于行政力量?我们也要教授治校,我们也要大师如云。好!有志气!那么,我们就得先从三流大学转变成二流大学。下面我就分析如何把北大、清华转化成世界二流大学。

3. 怎样才能办成二流大学？

我前面说过，顶级、一流、二流大学基本上没有本质的不同，差别在于历史、资源及地缘的关系^①。他们优秀的程度不同，但他们的办校宗旨、监管体制、考核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些学校实质上是教授当家。二流以上的大学，其实是一群学者的合伙组织（partnership）。而三流大学比较像工厂，教授只是拿薪水的“笔耕者”及“口力工人”。二流大学已经建立了民主体制，而三流大学却还是农业社会的君主专制。

从三流到二流要比从二流到一流难得多。从二流到一流，甚至从一流到顶级，只要有资源，肯拼命，就有可能做到。而从三流到二流是本质的改变、思想的改变、文化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用经济发展来做比喻：从二流大学到一流大学就如同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亚洲四小龙”想赶上英国与意大利。香港与新加坡用了三十年，到上世纪末已经做到了。从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就如同从满清的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共和国的工业社会，经历了一百五十年，到了 1990 年才算结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历史演进和社会转型。从二流到一流大学，是按同一个制度体系力争上游，而从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则否定了现有的制度体系。

在三流大学的体系里，文章数、学生数、头衔、行政职位是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也是物质报酬分配的依据。在全是三流大学的官本位国度里，没有也不需要开放性的学术市场。在“数字挂帅”的体制里，比的不是真知卓见，而是组织能力、“情商”。在三流大学体系里，博导可以任命，文章数可以计算。这种做法虽然不理想，但可执行性高；虽然大家都在做点没什么价值的研究，但是排起名来倒也有些次序。每个大学各混各的，相安无事。

但是，到了二流大学体系里，大师不是校长任命就行的，得有真知卓学。如果没有一个市场机制作为信息处理与汇总的工具，那谁又知道哪个是真大师，哪个是假大师呢？如果假大师的人数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结果比三流大学体系还糟糕。三流大学的博导是绵羊，校长吼一吼，他就乖乖地低头吃草。二流大学的假大师，是披着珍贵貂皮的野狼，可以把校长都吃了。哈佛的“教授参议会”2005 年前后赶走了一位做过财政部长、要改革哈佛教授懒散教学态度的年轻校长。这事谁对谁错，我说不清楚，人家哈佛有足够的真大师坐镇，如果那些假大师搞得过分，校长是冤枉的，真大师就都跑到普林斯顿或斯坦福去了。如果没有什么讲座教授因此离职，这个校长大概走得不太冤枉。这就是市场机制。中国有吗？（这里有个小注脚：这个校长要整顿的对象，就是一个讲座教授，他一气之下，拉了一批同事投奔普林斯顿去了。这位讲座教授是真大师、假大师，我不知道，隔行隔重山。但是，普

^① 关于历史与地缘对大学地位的影响，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四十年的查里斯·艾略特如是说：“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它不同于棉纺厂，运营六个月就可以满足一种迫切需要。一所大学不是靠多在报纸发表一些社论、大量发布广告或多拍几封电报就能建立起来的。”

林斯顿接受了这一批人马,哈佛校长因此去职,是非曲直,就有了公论,这就是市场机制。)

争创世界二流大学只是清华、北大进入世界名校的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要成为世界顶级大学。真正的教育家是办教育的,而不是争排名的,就如同真正的学者应该是好奇与探索,而不是算文章数量。争排名、做文章的毛手毛脚,我知道些,我也做过些。我一生的志向及绝大部分的精力还是做个真学者、好老师。作为一个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我是不相信绝对道德观的,我认为道德是成本效益盘算下的产物,是社会制度的衍生品。作为一个理性的社会科学家,我要贡献的是:如何透过理性的分析,设计一套制度机能,让人们自然地依据自利的动机,做到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因此,我对清华、北大的建议,不是怎么玩些手法,把排名弄上去,而是以社会精英的心态,怎么为中国打造一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在我前面的分析中,我已经清晰的指出:中国如果想要有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就得有两三所世界顶级的大学,这两三所顶级大学,会带动几十所一流大学;而这几十所一流大学,又会带动上百所二流大学。这些顶级、一流与二流大学是中国的知识泉源,会发展出千千万万的科技应用,会培育出无数个领袖、学者与教育家。我任教的清华、浙大与厦大,对此应该有舍我其谁的抱负!

在我的举例与分析中,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创建顶级大学最重要的一环,是以学术大师为核心的市场淘汰、监控与定价机制。顶级大学绝对不是一个官本位的农业社会所能产生的。没有一个官,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识别学术大师,但是市场能够。市场的识别能力超过任何的专家,市场的淘汰、监控与定价机制融合了市场所有专家的智慧。

中国以致亚洲都没有一个开放型的学术市场。在清华讲的是“三清”,东京大学谈的是“三东”。三清也者,本科、研究生、教授职位都出身清华也。我自己也有“三台”病:四十岁以前,我的梦想就是回母校台湾大学教书。整个亚洲的学术精英都染了严重的科举病毒。如果一个大师是由十八岁那场考试决定的,这个大师百分之百是假的。没有真大师,就没有二流大学,就更别提顶级大学了。没有开放的市场,就不可能有真大师。货真价实的学术大师是在残酷公平的市场上百炼成钢的结果。中国的高校只是些三流大学,真正的症结就在这里。因此要想成为一所二流大学,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教师队伍不能有近亲繁殖。所有博士毕业生都要进入公开市场,不能留校。

大海养大鱼,小沟养泥鳅。学术界的大牛大都集中在美国这个学术大草原上,这也就理所当然了。从最大、最公平的市场中杀出来的大师,应该是最厉害的。不只我们“落后”的亚洲得服气,近年来,连在“先进”的欧洲的大师们都有浓浓的美国牛排味。中国大学要玩二流大学的游戏,就得进入北美学术大草原。各位看到了吗?在表1,一个只有三千万人口的农业国家加拿大,居然有两家大学被列入一流大学,就是因为地缘优势:它们位于北美洲英语语系的学术大草原。如果把杜兰大学、南加大往南搬五百里进入墨西哥,那么它们就什么流都不是了。这就是地缘优势!

对于在中国生根的中国大学来说,地缘优势就别想了。但是,没有地缘优势,也能成为二流大学,香港科大不就做成了吗?香港科大还一度有一流大学的恢弘气势咧!出大师的学术

市场不是要大、要公平吗？中国学术市场虽然不公平，谁能说不够大呢？只要我们能借用美国的市场体制让中国学术市场做到透明与公平，那么，三十年后，世界新的学术中心在哪里，谁都说得准！

如果为了进入这个北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而要中国大学搬家，那是做不到的；但是，参与英语语系的学术市场的必要条件则非满足不可。我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用英文谈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真是憋气，深深的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心情平复后想想，咱们的汉文不就是中原西陲的秦戎话吗？中原周天子的话怎么说，现在谁也弄不清楚了。自然科学是不太受语言能力影响的，但是对人文社会学科来说，进入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则要难得多。这是进入市场的必要交易成本。我知道，北大、清华的经济、管理科系已经在做了，香港科大的建校原则就是世界（其实就是美国）标准。2006 年前后复旦大学要求我协助他们拟订世界顶尖期刊的排名，看来复旦也想杀进北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了。

有效的市场机制一定要有优胜劣败的竞争淘汰机制。美国二流以上的大学，都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就是所谓的“长聘（tenure）制度”。顶级大学的长聘制度可以说是冷酷无情、惨不忍睹的。连挂一流车尾的杜兰大学都是九死一生。长聘制度原来是用来保障教授的言论自由的，经过两百年的演变，却成了美国学术市场最重要的“净化剂”。长聘制度是让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列入长聘教授的候选人——称为“长聘岗”（tenure track），成为严格考核与培养的对象。这个考核期，在顶级大学是九年，通过了就是正教授，而且很快就成了讲座教授。而在一流与二流大学，这个考核期通常是六年，通过后就是长聘副教授。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的重要不同点之一，就是长聘制度的严格程度。顶级的斯坦福大学的长聘制度考核期是九年，而与它隔壁的一流大学伯克利则是六年。

在顶级大学经过九年的严酷考核，如果不被赶走，就成了大师。在顶级大学里，副教授这个职位是短暂的过渡。在较好的一流（表 1 中的“一流 A”）大学中，大部分的长聘教授都能升迁，可是在一流大学中资源比较不足的学校（一流 B），越来越多的只是终生副教授。因为在一流大学里，升迁的标准是看对手想不想挖你。没有人来挖角，你就好好的待着，一辈子都别想升成正教授。好的一流大学挖角的能力强，被挖的或然率高，流通机制好，就没有存货。次一点的一流大学，挖角能力弱，被挖的或然率低，存货就多。到了二流大学，实在是没有资源玩这个游戏了，但是还想成为一个学术净土，在给长聘时是按照一流的标准打了点折扣，到教授升迁的时刻，有些就只看苦劳不看功劳了。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大学大都没有采用这长聘制，所以就该列入三流大学之林。中国香港三大——尤其是港科大——对长聘制已经很认真地执行了二十多年。

这个长聘制为“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提供了丰富的供给与需求。有人称这个市场为“旧货市场（used market）”。旧货市场的买家，不都是穷人（较次的学校），豪门大户也热衷得很。因为真正的学术大师就像好酒，越陈越香。学术大师是二级市场的常客。在一流大学关于二级市场最常说的话——或在顶尖大学关于二级市场几乎唯一的话题，就是“某某

人有了什么成果,是怎么来的,又有那家学校挖他了”。这个丰富的二级市场,也为长聘制增添了新功能,即:淘汰、筛选、信息、激励。对于一个极难客观评价的学术来说,长聘制的这些功能太重要了。没有长聘制、没有丰富的二级市场,就不可能有鲜活热闹、蓬勃兴旺的学术。由于中国没有长聘制,没有开放型的学者构成的二级市场,中国就没有二流大学,更不必谈顶级大学了。请来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只是花钱买了个符号,而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研究成果,那才是顶级的大学。你知道吗?像杜兰这样的学校,是很少给诺贝尔奖得主荣誉博士的。我现在就是杜兰的荣誉博士遴选委员。我们要授予荣誉博士的学者,是那些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人。锦上添花不是一流、二流学校做的事。

在二流以上的大学里,重要的行政职位,尤其是校长,都是全世界公开遴选的。权力与钱财是腐化的根源。一流大学是有权有钱的学术单位,像商学院院长这样的顶级人才基本上是从外面引进的。一流大学的学术科系,每隔十来年就会从外面挖进一个系主任。外来的新主管有独立性,他不欠人情,没有瓜葛。他也有客观性,能冷静地分析这个单位的历史遗留问题,他的所作所为与决策不会马上引发关联性的猜忌。他有开创性,能把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引入。这方面我有个亲身的好例子:EMBA 教学是芝加哥大学首先推出的,可是芝加哥大学做得并不太成功。后来让西北大学摸出了门道,杜兰大学就挖了西北大学主管 EMBA 的副院长来当院长,做了两年,就出了成果;哥伦比亚大学又从杜兰手上把他抢了过去。就这样,EMBA 在美国遍地开了花,并影响了整个世界。

从我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如果关起门来自己搞,是建不成二流大学的。二流大学的建设要靠市场机制!因此,想要摆脱三流大学的困局,就得拉着一群背景相同、资源相似、有志往前冲的学校一起干,组建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学术市场。我们应该联结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顶尖大学成立像美国常春藤那样的学术联盟,与中国教育部共同推动,逐渐地将中国最有历史、最有潜力的大学的监管从教育部移转到校产基金会、校董会、顾问委员会手里,将学术专业的监管移转到公开的学术市场中去。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个真知灼见:“摸着石子过河”。市场不是一天就能造成的。市场的优化过程,纯粹是经验的积累过程,是一种结合所有参与者的经验与智慧,不断地改进与摸索前进,最后胜出的机制,这可不是任何一个设计师能单独推导出来的。认识并发挥市场机制在学术监管与激励的中重要位置,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一步,极不容易跨出;而只要能跨出这一步又不跌个四脚朝天,那么后面的路就会逐渐好走起来。

“摸着石子过河”的真髓是从一小步做起。改革如果打击面过广,步子太快,调子太高,是容易出问题的。能让人家老美夜以继日、不眠不息、老老实实的干真学问的动力,不是校长室的一纸公文,也不是某某大师的一声吆喝,而是那些老美俗不可耐的经济动机与市场压力。要在世界顶尖杂志发表文章,也不是随便说说就有的。学术这东西,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中国有这么多学者没有受过应有的研究方法、语言表达、思维方式的训练,硬是赶鸭子上架,只有“官逼民反”了。说到“官逼民反”,我在香港科大就犯过同样的错误。三流大学的问题关键就

在官本位的学术政策上,想用一纸官样文书搞改革是很难成功的。

我觉得,学术改革应该利导而不是势逼;用市场机制,而不是用官方政策。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寻找最容易突破的新成长点,并对原有的教师与学术单位做增量改革。譬如说,把教科书教好要比做前缘研究容易得多,中国大学许多老师可能无法用英文发表惊世之作,但用英文念教科书的本事总该有吧!因此计算成果的时候,把文章数的比重压低,把文章质量的比重提高;让教好书的比重大于劣质文章数的比重;升迁考核的时候,多邀请些香港与美国的华人教授参加,采用竞争上岗,竞争加薪。当然,这些都是无法立竿见影的工作,学术本来就不是方便面。自古以来,成功的改革从来都是文火煮青蛙。

4. 案例:香港科大是怎么沦落成为二流大学的?

中国香港科技大学(Hong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ST)的成立,在亚洲学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香港科大是亚洲第一个按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与框架构建起来的大学,找到了真正有当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背景、见识、能力与经验的吴家玮到香港来担负这个划时代的任务。其实,应该说是吴家玮找到了香港来实现他的理想,而不是香港人找到吴家玮去实现香港人的梦想。我不认为,当时在诺大的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及新加坡)会有任何一个官员或社会领袖能真正懂得一流大学是怎么回事。我要称赞中国香港的社会领袖,只有见多识广的香港精英才听得懂吴家玮说什么。大中华地区的所有自命为研究型大学的校长或准校长们,都应该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一本《香港科大教职员手册》,没事的时候看看,领悟一下手册条文后面的真正含义。

我要大声疾呼,建议我现在的老板们,聘请吴家玮做你们的顾问。你们肯定有吴家玮的聪慧,但你们没有他的阅历。学问的领悟需要在一流的环境中经过长期的熏陶才能慢慢深入骨髓。社会科学里的市场机制跟自然科学里的物理机制不一样。在书本里,物理机制的道理能说清楚九成以上,市场机制得从经验、观察与失败中去领会。只有在市场里玩过,才能知道市场规律。创办一流大学的道理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本文开篇所引用的杨卫校长那番话,2000年前是没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校长能如此精确地说出来的。这是因为杨卫有美国一流大学完整博士训练的经历,在做学生时,耳濡目染,听老师、同学点评英雄豪杰。而吴家玮在UC San Diego 当过常务副校长(Provost),他的经验与智慧是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可贵资源。

现在把话峰转回香港科大。1991年,当我接受科大的邀请去香港看看的时候,科大给我寄来了一些讨论港科大的愿景及方案的资料。这份资料与众不同,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与吴家玮深谈了几次,他的风度、气势、仪表、思想,与我见过的一流大学校长相比,犹胜一筹。他对科大的构想是许多美国一流大学校长的梦想——由于历史因素只能是他们的梦想而已。1991年到香港应聘的第一批教授,就是梦幻团队。一开始就同时拥有这么一批学者,是许多一流大学所无法企及的目标。在海滩之旁、峭壁之上的校园,吃定了书呆子的那颗清风皎月、美酒诗

书的浪漫心怀。这个校园能让耶鲁大学校长嫉妒得血压升高,更别提在可怕的哈林区之旁的哥伦比亚大学了。吴家玮带着科大的校园规划与建校大纲,到美国的顶级与一流大学转了一圈,立刻引起极大的轰动。我想,所有的华人,尤其是香港人,要为香港科大感到骄傲与兴奋。香港政府应该把香港科大作为重要的战略布局,把它发展成整个亚洲的学术中心。

但是,港科大在香港的发展并不是如我想象的那样顺利。我刚到科大不久,有一次跟的士司机在车上聊起港科大,他用非常愤怒的语气大骂港科大,说港科大校长贪污,在家里盖了大游泳池;又说港科大浪费人民血汗钱。我当时极为震惊!渐渐的,我发现:香港的新闻媒体几乎不报道科大;即使报道,也是批评多,赞誉少。在香港的各个角落,几乎闻不到一丝以科大为荣的气息。我们这一群很把自己当回事、在世界上也有些人把我们当回事的书呆子,在香港平民的眼中,啥都不是,就只是一群糟蹋粮食的饭桶而已。

的士司机不了解港科大,也就罢了;可是大学生应该了解我们这些国际知名学者的来头吧!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还不争先恐后的报考港科大?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在港科大的时候,若以师资的真实本事来排名,应是港科大第一,港中文第二,港大第三。由于香港的经济高速发展,所以越新的学校师资越好。而港大是老校,师资当然最差,当时有些港大的教授可能还做不了科大的研究生。在香港待了一阵子后,我对香港的高校招生有了一定的了解,我惊奇的发现:港科大是香港学生的第三志愿,甚至是第四志愿。可见,连香港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把我们这些很把自己当回事的书呆子当一回事。

有些教授——包括我在内——就建议说,我们有这么好的师资,我们应该向全世界招生,尤其向中国大陆招生,为祖国服务。我还兴冲冲地在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大陆为科大宣传,期望扩充其影响力,号召当地最好的学生报考港科大,结果也还真有些学生跃跃欲试。但很快我们就发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大陆都是“官本位”,根本没有市场机制,跨地域招生得通过四地教育部门协调。可这一协调要等到猴年马月呀?

逐渐地,港科大的有些老师“飞”走了,“飞”向了海角天涯;而留在香港的老师,有些被其他学校慢慢地挖了墙角。逐渐地,在世界学术市场上,港科大不再是亚洲唯一的亮点,不再英气勃勃。在1991年,香港科大在世界顶级学者们眼中是亚洲唯一的一流大学,而到了1999年,却沦落为二流大学了。更可悲的是,在香港百姓的眼中,科大只是香港地区的二等大学!

香港科大的案例,为我的理论提供了实证,也为中国顶级大学发展学术、进入世界二流大学和一流大学的进程提供了一些启发。一流大学要有资源、历史及地缘条件。港科大在1991年,满足了资源的条件,而且满足了资源条件中最难的一项,即:聘到了学校领导人与学术领导人。吴家玮与他请来的创校教授,对一流大学的操作与学术市场的深刻了解,是至今还没有亚洲另外一个大学可以比拟的。

当然,港科大的创立,也有其基因病原(genetic disease)。其中之最,就因为它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就得跟没有专业知识的官员、议员打交道。这些官员、议员是学校的衣食父母,他们态度高傲蛮横(尽管这样,中国香港这方面还是要比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好多了),而一流

学校的操作是很难用客观的短期指标来衡量的。科大与这些官员、议员打交道,简直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还有,官员与议员有他们自己的烦恼与忧愁,他们可不会像我们这些书呆子那样为办好一流大学而拼命。

香港科大从零做起,没有历史,也就没有历史包袱;但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群众基础。我起初有点纳闷:香港的官员、议员、学者、新闻记者中,应该有不少人是多少知道吴家玮干了件多不容易的事的。可为什么就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为香港科大说句公道话呢?后来想想,他们能说什么呢?正如前面所分析过的那样,一流大学与三流大学之间的转变是一种模式改变(paradigm shift),一流大学的思维基本上是否定三流大学的体系的。这些官员、议员、学者、新闻记者大都是港大、港中文的毕业生,难道要他们称赞这些外籍兵团而否定自己?这就如同孙中山当年到北京跟大官僚李鸿章谈变法,到底是李鸿章听不懂、还是李鸿章不至于傻到自残?

香港科大的地缘位置,也注定让它难以保住一流的架势。大家知道,香港只有六百五十万人口,作为香港特区的一所公立学校,当时是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招生的,所以招生就只能限于香港那一块弹丸之地。各位看看表 1 列出的一流大学,哪个不是全球招生的?香港科大是用国际一流的师资去教香港二流的学生,不但是资源浪费,而且师生都觉得辛苦难过。最近,香港在谈教育资源整合,香港科大这个名字都有可能成为历史名词了。没有历史、没有群众基础,就没有足够的选票来保护这个品牌。

香港科大曾经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梦幻资源:一个有眼光、有魅力、有本事的校长;一群著作等身、国际知名的教授;一个青山绿水、优雅宜人的校园。但是港科大没有历史、没有地缘优势;更重要的是:港科大是一所公立大学,陷身于扯不清的政治泥沼。港科大在短暂的辉煌后,回落成香港高等教育的一介平民,成了一所世界级的二流大学。

如果我们以搭建香港科大品牌来评价吴家玮,吴校长并没有取得巨大成功,我评给他一个“良”(即西方的“B”)。但如果我们以搭建学术平台来评价吴家玮,那他的成功是划时代的。他并没有把香港科大办成一流,但是他把香港的七家大学办成了二流。他的影响还扩展到了新加坡与大陆(但台湾是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我前面分析过,从三流大学进入二流大学是思想的改变,是质的飞跃。一旦进入二流大学的层次,再要向前进入一流大学,那就只是资源与决心的问题了。

在香港科大创建之前,亚洲的所有大学都是封闭式教学型的大学。别说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别提参与北美学术市场,就在同一个城市内的大学间都老死不相往来。在 1990 年以前,亚洲最西化、最进步的新加坡大学与香港大学的老师都只是些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学士与硕士。这些地区的学术领导人还公开说澳大利亚的硕士训练都要比美国博士好得多。而在中国台湾的大学里,学者们都是本校弟子,许多是从助教按年资爬上来的。在世界顶级的学术会议上看不到来自亚洲大学的学者的。别说在“擂台”上,就连在观众席里都看不到来自亚洲大学的学者的影子。可喜的是,近年来亚洲大学的学术风气日渐浓厚,香港的三大,甚至七大,都进入了二流大学之林。这些可喜的发展,与香港科大的创建所引起的对欧美学术领袖的重视与另

眼相看,进而“逼”着亚洲大学的学术当家人打开大门面向世界,是有密切关系的。

5. 结语

我对中国大陆与大中华地区的经济与学术发展是非常乐观的,不过有些人说我是盲目乐观。但是,我逐渐发现:就是这个“盲目乐观”的我,也都低估了中国大陆与大中华地区进步的速度!

一个一流大学的内部条件是“资源、历史、地缘”,外部条件是“开放、透明、竞争的学术市场”。中国的北大与清华起码有了历史与地缘的优势。中国之大,没有人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垄断学术市场或阻止学术市场的发展脚步。这个庞大的学术市场,会养出大鱼,北大与清华都有可能是条大鱼。我认为,北大与清华的长大是必然的,但要长得好,就不是必然。学术如同好酒,资源、历史、地缘有了,外部环境对了,剩下的就是耐心的等待。当今之急,是寻找资源与妥善运用资源;同时耐心地、逐渐地改变外部环境。

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是君子之争,合作是道义的合作。研究型大学的师生是在学校与学校之间不断地流动的。这些流动切断了个人的私心,丰富了信息,辅佐了判断,加强了监控。

进入一流大学最难的一步,就是从封闭性中跨出来。改革与利益重新分配是孪生兄弟。在改革中,现有的当家人、在位者是输家。吴家玮并没有把香港科大办成一流,但是在新生的香港科大却没有输家,个个是一流大学的支持者,甚至是狂热的信徒。港科大的成功站住脚跟,有了成果,让香港其他六所大学能兵不血刃地进入二流大学。一个成功的大学改革,压力要来自外部,不能来自上面,更不可能来自下面。北大的成功蜕变要靠来自清华的压力,清华的成功蜕变要靠来自北大的压力。公开的、透明的、全球性的市场竞争是必要的压力机制。

参考文献:

- Avery, C., M. Glickman, C. Hoxby, and A. Metrick, 2004, A revealed preference ranking of U. 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BER Working Paper.
- Manski, C. F. and D. A. Wise, 1983, *College Choice 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pence, M. 1974, Education as a signal, Chapter in *Market Signal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2006, College Ranking.